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中国近代史

(第二版) 下册

《中国近代史》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04-052655-4



9 787040 52655

定价 36.70元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中国近代史

(第二版) 下册

《中国近代史》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二维码资源访问

使用微信扫描本书内的二维码,输入封底防伪二维码下的 20 位数字,进行微信绑定,即可免费访问相关资源。注意:微信绑定只可操作一次,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请您刮开防伪码后立即进行绑定操作!

教学课件下载

本书有配套教学课件,供教师免费下载使用,请访问 xuanshu.hep.com.cn,经注册认证后,搜索书名进入具体图书页面,即可下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史. 下册 / 《中国近代史》编写组编. --
2 版.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1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ISBN 978-7-04-052655-4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88442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封面设计 王 洋 版式设计 于 婕 插图绘制 于 博
责任校对 张 薇 责任印制 耿 轩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http://www.hep.com.cn
邮政编码	100120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cn
印 刷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http://www.hepmall.com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http://www.hepmall.cn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字 数	310 千字		2020 年 1 月第 2 版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印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定 价	36.7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52655-00

审图号 GS(2019)2810 号

目 录

第八章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1
一、《新青年》杂志与“德”“赛”二先生	1
二、文学革命	4
三、对儒学的批判和儒学的衰落	7
第二节 五四运动	10
一、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的失败	10
二、五四运动的爆发及意义	12
三、各种新思潮的涌入	17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成立	19
一、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22
三、中共二大的召开和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	26
四、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	28
第九章 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	32
第一节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	32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前的国内外形势	32
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思想的逐步形成	36
三、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方针的确立	41
四、中国国民党的改组	42
第二节 国共合作的建立与国民革命的兴起	43
一、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与国共合作的建立	43
二、黄埔军校与广州国民政府建立	45
三、五卅运动与省港大罢工	47
第三节 北伐战争与国民革命的高涨	49
一、北洋军阀混战与北伐前的北京政局	49

二、北伐胜利进军	52
三、工农运动的深入开展	54
四、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	56
第四节 国共合作的破裂与国民革命的失败	58
一、国共统一战线的分化与斗争	58
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59
三、武汉“分共”与国民革命夭折	61
第十章 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与土地革命战争	66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及其内政外交	66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	66
二、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	68
三、改组派的反蒋活动与国民党新军阀混战	71
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	74
五、废约外交	78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	80
一、发动武装起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	80
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与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	84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立与苏区土地革命	87
四、“围剿”与反“围剿”	90
五、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93
六、红军长征	94
第三节 30年代前后的社会、思想和文化	99
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与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	99
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	102
三、教育与科学研究	104
四、乡村建设运动	106
五、中间政派与蒋介石集团的争斗	107
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与中国局部抗战	111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与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	111

一、“九一八”事变与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111
二、“一·二八”事变与淞沪抗战	116
三、热河沦陷与长城抗战	117
四、察哈尔抗战与福建事变	119
五、国民党政府坚持“安内攘外”方针	121
第二节 华北事变与全国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涨	123
一、华北事变与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	123
二、“一二·九”学生运动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126
第三节 全国团结抗日局面的初步形成	128
一、瓦窑堡会议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初步确立	128
二、国民党对日政策的调整	130
三、“两广事变”与绥远抗战	132
四、西安事变与国共第二次合作	133
第十二章 全民族抗战的坚持与胜利	138
第一节 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	138
一、卢沟桥事变与全国抗战开始	138
二、八路军、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140
三、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	145
四、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转轨	150
第二节 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战局与政局	151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151
二、战略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154
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	159
四、国民党反共与皖南事变	166
五、民主宪政运动和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	168
六、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	171
第三节 全国抗战时期的经济、政治与文化	173
一、国民党的战时经济政策与大后方的建设	173
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176
三、延安整风运动	178

四、抗战时期的学术研究与教育	179
第四节 日本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	183
一、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	183
二、日本扶持华北伪政权和汪伪政权	185
三、沦陷区民众的反侵略斗争	188
第五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	189
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的国际局势	189
二、中美、中英“新约”签订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191
三、豫湘桂战役的溃败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193
四、滇缅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攻势作战	197
五、中共七大的召开及其重要影响	200
六、日本无条件投降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202
七、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	205
第十三章 国共谈判与全面内战的爆发	208
第一节 战后时局和各党派的政治动向	208
一、国民党坚持独裁与力图独占抗战胜利果实	208
二、中共主张和平建国方针以及在华北华东的接收	211
三、民主党派的政治活动	214
第二节 和平谈判与政治协商	217
一、国共重庆和平谈判	217
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220
三、停战谈判与美国调处国共冲突	223
第三节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	225
一、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225
二、国共关系全面破裂	228
三、人民爱国民主运动与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230
第四节 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转折	233
一、解放区工作的拓展	233
二、土地改革	235
三、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237

四、夺取全国胜利纲领的制定和实施	240
五、各大战场继续推进	243
第十四章 国民党统治的覆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45
第一节 国统区的全面危机	245
一、国民党政治危机的加剧	245
二、国统区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	247
三、财政金融危机的总爆发	249
四、国民党腐败的加剧	252
第二节 历史性的战略决战和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254
一、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	254
二、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与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263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67
一、为新中国绘制蓝图	267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局面基本形成	268
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和《共同纲领》的通过	271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274
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	276
阅读文献	278
人名译名对照表	285
第一版后记	289
第二版后记	290

第八章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辛亥革命后，政局混乱，社会动荡，袁世凯及北洋派官僚的专制独裁本质日益暴露，民主共和名存实亡。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国家危亡的深层原因，发起新文化运动，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洪流。五四运动的爆发，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俄国十月革命的直接推动下，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一、《新青年》杂志与“德”“赛”二先生

辛亥革命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仅仅靠移植西方政治制度难以挽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于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是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青年时代曾两度赴日本留学，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12年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协助章士钊编撰《甲寅》杂志。1915年9月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添加一个“新”字，不仅使其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一目了然，而且也反映出“起点新、内容新、目标新、形式新”的全新面貌。1917年1月，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从上海迁往北京。《新青年》前3卷为陈独秀主编，从第4卷开始由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胡适六人轮流编辑，后又有陶孟和、高一涵加入。北京大学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陈独秀因在这一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后世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青年杂志》发刊初始，明确定位在探讨青年修身治国之道，介绍世界形势和学术，激励青年志趣和精神。本着这一办刊宗旨，在《敬告青年》的创刊

词里，陈独秀提出中国青年应有“政治的觉悟”和“伦理的觉悟”。所谓“政治的觉悟”包括国民对自身正当政治权利的要求，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代替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多数国民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所谓“伦理的觉悟”，“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与其一必废其一”。陈独秀以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①，从而将思想解放的锋芒直指伦理领域，发出新文化运动呼唤个性解放的先声。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陈独秀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把科学与人权（即后来的“民主”）作为近世以来社会发展的两大要件。他认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明确表达了《新青年》学习“德先生”“赛先生”的诉求，亦即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他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②陈独秀的这一指向，代表了《新青年》同人的共同信条，实际上也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主流选择，即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建设西洋式的新国家。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倡导者是李大钊。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直隶乐亭人。曾留学日本，1916年回国。他在日本期间撰写《青春》一文，发表在《新青年》，呼唤青年发挥青年之自觉，“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③

1916年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办学原则，并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等人来校任教，使北大成为新思想的生长地和外来思潮的主要输入者，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1916年2月15日，第4页。

^②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15日，第10—11页。

^③ 李大钊：《青春》，《新青年》2卷1号，1916年9月1日，第11—12页。



五四时期的著名期刊《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

采自《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二、文学革命

新文化运动初起时局限在少数觉悟的知识分子圈，能发展到具有相当社会影响的文化运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学革命”。狂飙突起的“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取得重大进展的突破口。

民国初年，在专制横行、政治乱象丛生的社会环境里，文坛也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萎靡、庸俗败象。桐城派在文学界仍有相当大的势力，以艳情、武侠、宫闱为主要题材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充斥着报章杂志，旧式戏剧占据舞台。同时，中国长期使用的文言文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此，富有进取心的新文化人开始探索改进中国文学的路径。1915年9月，在美留学的胡适与梅光迪辩论时，曾赋诗自许：“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第一次使用“文学革命”这一名词，在留美学生中引发了一场关于新文学的讨论。1916年2月3日，胡适致信陈独秀，表示：“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①陈独秀回信一方面表示赞同胡适的意见，一方面敦促胡适，“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盼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新青年》。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首先提出改良文学的“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主张“言文合一”，以白话为“文学的语言”，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表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②。胡适所说的“八事”，显然是针对旧文学的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的弊病而发。接着，陈独秀在《新青年》2卷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将胡适“文学改良”的主张提升到“文学革命”的层面，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③将文坛颇具影响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

^① 胡适：《论译书寄陈独秀》（2月3日），曹伯言整理：《胡适全集》（1915—1917）第2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页。

^②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1日。

^③ 陈独秀：《文学改良》，《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1日。

列为“文学革命”的对象。胡、陈二文标志着“文学革命”运动的正式发起。

“文学革命”初期的基本理论主张是“用白话文作文作诗”。这一主张“一面要推倒旧文学，一面要建立白话为一切文学的工具”，其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为此，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中发表自己的见解，他指出，“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推倒以骈文古文律诗古诗是“正宗”的正统观念，重新建立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纳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胡适的主张如石击水，迅即产生强烈反响，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人先后著文，从不同角度阐发自己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钱玄同致信《新青年》编者，引为同调，他激烈批评拟古的骈文和散文，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进一步说明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必然性。刘半农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等文，就改革韵文、散文，如何创造白话文学和使用标点符号提出建议。傅斯年发表《怎样做白话文》一文，提出白话文必须依据我们说的活语言，必须先讲究说话；白话文必不能避免“欧化”，只有欧化的白话方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

随着对文学语言认识的新突破，新文学创作也取得很大成就。新文学运动在创作上最先获得成功的是诗歌和小说。1917年，《新青年》4卷1号发表了胡适等人的第一批新诗；1920年，胡适出版了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胡适早期的诗作经历了一个从文言文到半文半白再到白话文写作的过程，他尝试“以白话入诗”，用他自己的话说：“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真正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开一代诗风的新诗作品是郭沫若1921年8月出版的《女神》，作品以浓烈的浪漫主义，抒情、自由、奔放的创作个性和展翅高翔的艺术想象力，充分表现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堪称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1918年5月《新青年》4卷5号发表鲁迅创作的小说《狂人日记》，这是第一篇用现代文体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它以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从此鲁迅“一发即不可收”，在1918—1922年连续写作了15篇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在1923年结集为《呐喊》出版。它们以独特的题材和叙事模式，新颖、别致的文学形式和对国民性的深刻解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

“文学革命”的迅速开展，激起了具有保守倾向的学者文人的反对。近代翻译文学的先驱林纾早年在译介西方文学方面卓有成就，但他却抱持“桐城

派”的旧文学观念不放，极力阻挠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对新文学及其倡导者大肆攻击。同时，北京大学的旧派学生以刘师培、黄侃等人为后台，创办了《国故》月刊，以“昌明国粹”、维护文言文的正统地位相标榜，竭力排斥和反对新文学。1922年，梅光迪、吴宓等人在南京创刊《学衡》，批评当时新文化人的主张是“浅薄的”“野蛮的实用主义”，主张以一种“与一切时代的精神相合”的“世界性”“恒常性”观念来衡估文学的价值。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新文学运动的攻击，表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恋和维护。但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对文学价值的不同理解，这对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激进偏向构成了一定的制衡。

1921年以后，新文学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为新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新的生长园地。最早成立的新文学社团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1921年1月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由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朱希祖、瞿世瑛、蒋百里、孙伏园、耿济之、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12人发起，会员前后有170多人。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①，具有写实主义的倾向。该会创办《小说月报》《文学旬报》。1921年6月由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东京成立的创造社，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他们主办《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半月刊等刊。这两大社团是五四时期最活跃、也最具影响力的新文学社团。

新文学运动在短短的四五年间，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918年，《新青年》率先垂范，开始全部用白话文发表文章。1919年、1920年两年间，全国大、中、小学生刊物有400多种，全是采用白话文发表。一些著名的老牌刊物，如《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也改用白话文刊登作品。1920年，教育部正式颁令全国，从该年秋季始，所有国民小学一、二年级的教材，必须完全用白话文。这说明白话文作为通行的“国语”获得了官方的承认。

“文学革命”的实质，是用民主主义的新文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在文学形式上，它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追求创造“活的文学”，使文学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在文学内容上，它主张个性解放，伸张“人的

^① 《文学研究会简章》（1921年1月10日），贾植芳等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文学”的观念，以平民劳动者、新型知识分子等人物形象代替旧文学中的主人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使文学负载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内容。它大力发掘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养料，自觉地构建起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密切关系，形成了面向世界而又不脱离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开放性的现代文学新格局。“文学革命”在对待传统文化，处理与西方文学的关系方面，虽然还存在着一些偏颇，但它从总体上推动中国文学发生了深刻变革，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三、对儒学的批判和儒学的衰落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反对孔教，批判儒家学说。

1912年10月，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出面在上海发起“孔教会”。1913年4月，康有为发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地议》，称：“欲救人心，美风俗，惟有亟定国教而已；欲定国教，惟有尊孔而已。”^①8月，陈焕章、严复、梁启超等上书参、众两院，提出《请定孔教为国教》请愿书，提议将孔教列为国教，写进民国宪法。康有为、陈焕章师徒二人的孔教主张，表明了他们试图强化儒学政治地位的企图。康、陈倡导的孔教运动与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冲突，这场冲突表面上看是一个文化上如何对待孔教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建立民国的政治文化问题。

《新青年》就儒学问题展开讨论，最早发表文章的是易白沙，他在《孔子平议》一文中，从尊与被尊两个侧面研究了尊孔现象的发生史，认为“孔子以何因缘被彼野心家所利用”，成为文化专制主义的工具，主要是因为孔子本身有“尊君权”“讲学不许问难”“少绝对之主张”“但重作官，不重谋食”四大缺陷。^②易白沙直接批驳了康有为称孔学为国学，称孔子为素王等观点，批评康有为之倡孔教不合时宜。

在《新青年》中，攻击孔教最为激烈且最有影响者当推陈独秀。陈独秀发表的相关文章有《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复辟与尊孔》等，这些文章多置于《新青年》刊首，可视为《新青年》的“社论”，足见陈独秀当时对这一

^① 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1913年4月），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46页。

^② 易白沙：《孔子平议》，《新青年》1卷6号，1916年2月15日。

问题的重视。通览陈独秀诸文，他的基本观点主要是针对康有为“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的主张而发，反映了陈独秀当时关注的主要是政治文化问题。第一，他将孔教与复辟帝制并联在一起，在政治上置孔教于反面地位。“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若并此二者而主张之，无论为祸中国与否，其一贯之精神，固足自成一说。”^①“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②第二，反对在宪法中写入尊崇孔教的条款，认为这与民国崇尚思想自由的宪法精神不符。陈独秀认为：“以何者为教育大本，万国宪法，无此武断专横之规定。而孔子之道适宜于民国教育精神与否，犹属第二问题。盖宪法者，全国人民权利之保证书也，决不可杂以优待一族、一教、一党、一派人之作用。”^③第三，从中国的国情看，中国历史上并无所谓国教之说。中国非宗教国，“孔教名词，起源于南北朝三教之争。其实道家之老子与儒家之孔子，均非教主。其立说之实质，绝无宗教家言也。夫孔教之名词既不能成立，强欲定孔教为国教者，詎非妄人？”^④第四，从孔子本身的思想看，它并不适宜现代生活。“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⑤最后，从现实需要看，应以科学信仰为正轨。“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余辈对于科学之信仰，以为将来人类达于觉悟获享幸福必由之正轨，尤为吾国目前所急需，其应提倡尊重之也，当然在孔教、孔道及其他宗教哲学之上。”^⑥可以说，陈独秀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康有为的孔教观做了全面清算。

吴虞是新文化阵营中另一位攻击孔教的“健将”。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等文，“他的非孔文章大体都注意那些根据孔道的种种礼教、法律制度、风俗。他先证明这些礼法制度都是根据于儒家的基本教条的，然后证明这种种礼法制

①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2卷2号，1916年10月1日。

② 陈独秀：《复辟与尊孔》，《新青年》3卷6号，1917年8月1日。

③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2卷3号，1916年11月1日。

④ 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1日。

⑤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2卷4号，1916年12月1日。

⑥ 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1日。